泡沫博士,漩涡中的“学术民工”

“博士生不如研究生、研究生不如本科生”,这是人们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总结的顺口溜,博士越来越多,但质量是不是稳定,却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8月24日,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出炉,一组令人震惊的调查数据,披露了当前中国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众多问题,其中提到的一个导师最多同时带了47个博士生,更是焦点之中的焦点。处于风口浪尖的周光礼教授,这几天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武汉的媒体同行告诉我们,估计是这本书让很多人不高兴了,周教授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不便再说话。周光礼陷入了沉默中,但这本书抛出的问题却引发了热议,博士是不是已经严重泡沫化了?接受柒周刊采访时,尽管不少专家对调查样本采集的科学性还存保留态度,但他们都达成一点共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的确下降了很多。

□快报记者 谢静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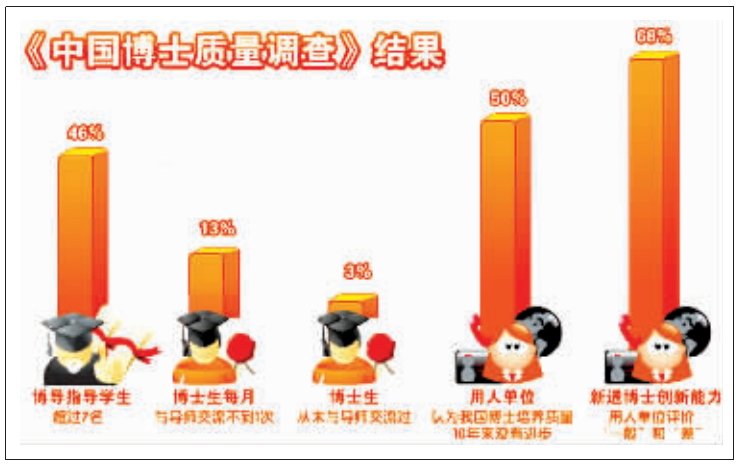
[量多质降]

博士生数量多了,质量却下降了

“浓缩的才是精华,但如今的博士生数量太多,培养质量也一落千丈。”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博导介绍,自从1999年扩招以来,博士生教育一直有“质量下降”之虞,一些论文造假事件也助长了质疑之声。

周光礼教授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2009年,全国在校博士生24.63万名,这个数据是1999年5.4万的4.56倍;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但是与数量猛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却在下降。

昨天,南京一位博导毫不客气地指出,全国每年会评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些论文的水平还比较高,但更多的博士生论文中毛病一大堆。比如大段大段抄录他人论著资料、数据,乃至论证过程和论点。很多选题缺乏创新价值,炒冷饭的很多,这些现象近两年更为严重,登录论文库稍微看几页,就会发现有的论文“似曾相识”。“还有一些博士生的论文连英文单词都会拼写错误,基本功不扎实啊。”



[老师说]

读博动机不纯,生源质量变差

在周光礼看来,博士生培养质量下降主要是由于博导水平不够,博士生读博的动机很功利,博士生急功近利等因素造成的。

“现在博导对学生的指导力度确实有待提高,导师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仲伟俊坦言,有一部分导师和学生见面很少,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博导水平和国外也有很大差距,掌握科研的方法也有改进空间。但是,我们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发现,生源质量本身也在明显下降,博士生明显不如过去那么用功。

还有一位博导透露,现在许多学生过于实际,缺乏学术研究方面的精神,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社交、打工以及外语的学习中去,从而忽略了自己的专业,有的甚至连导师布置的每周一篇笔记的要求都完不成,要他们完成的前期调研数据也是迟迟交不上来。

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博导埋怨说,“在博士招生的时候,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介绍人来,一看就是想来混个博士帽的,压根不是来搞科研的。但是不接受也不行,有时是迫于领导的压力、有时是不好驳了朋友的情面。这样搞下去,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怎么可能提高?”

[学生说]

导师常年在国外,一年才见一次

“我们导师是这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常年要出国,有的时候一年都难见上一面。”昨天,南京的一位博士生告诉记者,导师连面都碰不上,学术上的指导就更谈不上了,很多事情都是和师兄们讨论交流的。如果碰上什么问题,就由师兄们通过邮件向导师请教。他说,当初选择这位导师,说白了就是他的名头大,将来毕业了,可以骄傲地说,自己师出名门。如果要出国,名气大的导师写推荐信,效果也更好。

虽然已经读博第二年了,但赵同学和导师的联系基本上都限于电话和邮件。“博士生除了要代老师指导硕士小师弟外,自己有问题了,大多数时候只能与课题组里另外一两位没有资格带博士生的老师切磋。”赵同学说,一个月能和导师聚一次探讨学术问题就已经不错了,因为自己的导师那么多的社会兼职,还要带硕士研究生,还要出席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博士生,更谈不上在某个学术问题上共同研究,顶多是给自己指出一个大致方向。在这里读博主要靠自觉,没有人管你每天是否有进步。有些同学无故离开学校十天半个月的,也从来没有老师过问。“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有很多导师还是会每周开个小型报告会,和博士生探讨课题的。”

不敢给博导打电话,就怕接任务

周光礼教授的调查还披露,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成廉价劳动力。“这种情况是有,但不同学科的严重程度不同。”在电话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博士生李同学显得有些谨慎,他透露说,偏工科专业的博士生为“老板”干私活的几率更高,比如建筑设计、自动化等等专业。因为导师经常在外接项目,如果接到一个大的研发项目,就把项目分解给不同的学生,每个学生负责一块内容。最后导师会根据项目的情况给学生分钱,给多给少那就要看导师了。有一次完成一个企业的合作项目,导师每个月固定给他800元,但他发现,按照企业的计划,他每个月个人应该能拿到接近3000元,差额部分都成为了老师自己的“利润”了。

“我读的是四年博士,有两年在国外读书,但是假期回国的时候都不敢去拜访国内的导师。”马先生博士毕业一年了,“只要去看导师,他就会笑呵呵地问,‘你最近忙不忙啊?’通常当你还没来得及回答的时候,导师就会紧接着说,‘不忙的话,帮我搞个项目吧。’想拒绝根本不可能,谁让他是‘老板’呢?”

在偏文的专业中,经济、法学、管理类的博士生也时常要为导师干点私活,不过不是做项目,而是编书。今年暑假,金融学博士生小涵(化名)就异常忙碌,每日几乎就是图书馆和寝室两点一线,把暑假过得俨然考试周一般。她说,“这个暑假她都忙着为导师编书,而不是正经地念书写论文。老板常常有出书的任务,于是就分章节跟学生分工,有的负责收集资料,有的负责写。”

导师带十几个学生,太正常了

周光礼教授的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一个导师47名学生,我觉得有些夸张,但一个导师带十几个博士生的,就太正常了。”

昨天,南京一位博士生告诉记者,大多数是带个七八个,多的十来个人。他的导师名下就挂着二十多个学生,有硕士也有博士。有的导师是业内的权威专家,慕名而来的人也多,有的在职博士生经常不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老师不具备收博士的资格,他们带的博士生就只能挂在别的老师名下。

“我们导师也带了20多名学生。”一位经济学博士生算了一下,其中5个人是脱产博士生,4名在职的博士,另外还有10个是硕士研究生。这个数字不太准确,因为有的在职博士不经常来,大家也碰不上面。

“博导带学生的数量和专业也有关系,理工科的老师带的学生相对少一些。”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仲伟俊介绍,在博士生快速扩招的几年内,各个学科的生源发展不均衡,有的学生生源猛增,导师根本不够用,也就造成了部分专业导师带的学生过多。经管等偏文专业的导师名下的学生就比较多,但最近两年,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反响]

博士生质量急剧下滑是不争事实

有关《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新闻报道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争论,众人褒贬不一。“看完这个调查的主要内容,我的直觉就是数据取样有些问题。”昨天,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博导陆小华质疑,全国的在校博士生有20多万人,但周光礼这次调查收到的有效问卷只有1392份,调查对象还涉及了四类人,平均一类人不到350份,这也不符合统计学的原理。另外,从博士生的培养来看,各类院校、各个学科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不知道抽样是否覆盖到了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博士生。

“周光礼教授的这份调查,用这么少的数据就轻松得出结论,感觉有些以偏概全。”

“对这份抽样调查的科学性、可信度,我也持保留态度。”仲伟俊表示,样本还是太少了,而且这些样本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学校,目前都不知道。

“数据我不作判断,但对博士生培养现状的一些分析,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最起码博士生的质量的确是在下降。

熊丙奇认为,现在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严格博士教育的出入机制,实现宽进严出,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明确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热议

有淘汰才有质量

2000年至2006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几度超过20%,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同期5%的增长速度。诚然,每个国家的博士生教育发展都会经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比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博士授予数也一度居高不下,年增长率一度高达15%,但随后很快进行了调整。对我国而言,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数量剧增后,博士生教育已经到了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重要关头。

要保障、提升博士质量,首先必须严格贯彻博士学位授予的质量标准。原创性是博士论文最为核心的要求,也是博士论文的质量底线。由于严格贯彻这一要求,高等教育强国的博士生不仅淘汰率高,修业年限也相对较长。根据美国2008年的统计,在1992至1994年间注册的12135名博士生当中,共有31%在前10年被淘汰,其中前4年淘汰的博士生最多。

而在我国,由于受到人情因素的影响,加之学制僵化,综合考试“走过场”、论文评审“放水”的情况时有发生,结果是大部分学生按时毕业,淘汰率几乎为零,少数不合格的博士论文蒙混过关。

今年,我国博士招生的指标达到6.2万人。如果不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我国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博士教育第一大国,但在质量上仍然与高等教育强国相差甚远。

(8月26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教育功利化流弊

硕士博士等研究生成为“学术民工”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而这个调查再次验证了这个现象的存在。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中浅层的部分,更严重的是,中国高端人才的培养机制已经出现重大问题,“博士大国”则是属于高等教育功利化的典型流弊。

就目前来说,读博士好像变成很多人获取文化资本的渠道,“博士”变成了“搏仕”,纯粹为了科研与学术而读博的人凤毛麟角。还有的就是一些官员或者老板,将博士头衔作为炫耀的资本,或者为仕途添加筹码,总之,读博士的动机很大一部分出于功利化的驱使,与学术科研八竿子打不着了。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而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进一步透露,相当数量的官员读博,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

与欧美各大学的“宽进严出”博士培养机制相比,我们的博士培养基本上已经变成“宽进宽出”了,这样迥然不同的进出机制,就导致了迥然不同的人才产出,各种沽名钓誉的人最后都能顺利拿到学位,于是这样的博士大国,其价值贬值就成了必然。

教育是民族发展和振兴的根本,而高端教育则直接是国家之间“真刀真枪”比试的武器,博士人才作为一个国家科研与学术的顶尖与核心力量,必须为国家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价值,而不是为官场培养后备军。但我们现在依靠这样一些“高端人才”,拿什么和那些拥有严格博士教育机制的国家竞争呢?不断爆出问题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着手改善。

(8月26日《华商晨报》,有删节)